

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 动因及结果

李 意

摘 要 2010 年底以来在阿拉伯国家爆发的抗争事件,以反专制、反腐败、追求自由、要求社会公正为诉求,体现了阿拉伯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社会形态、宗教与世俗力量对比,对世界大国力量博弈、文明结构的动态变化产生了现实和深远的影响。文章借用抗争政治理论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抗争事件,从这些国家抗争政治产生的原因入手,推断阿拉伯国家抗争政治可能导致的结果,进而对中东阿拉伯国家这一政治变迁的重大实践活动进行理论上的反思与总结,旨在揭示其政治转型的内在规律及特殊性,同时检验西方“抗争政治”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能否正确反映和指导中东国家的政治实践。

关键词 阿拉伯国家 抗争政治 政治变革 民主转型

以 2010 年底发生在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①为开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除了沙特等海湾君主国暂时稳定外,其余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笼罩在民众激烈的抗议情绪下,抗议群众提出的重大政治要求包括总统或国王下台,政府改组公平选举,实行民众参政、保障民权与改善民生等。面对阿拉伯现代史上如此规模宏大、波及面广且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国内外学术界纷纷着力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与变革研究。由于其具有突发性(突尼斯和埃及动荡发生之突然与两国旧政权颠覆之快都出乎意料)、多样性(发生政治变革的中东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政治变革

* 李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83)。

** 本文是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中的伊斯兰因素”(项目编号:11YJC810024)、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年度校级规划基金“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与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01111403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受第 51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2M511021)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的资助。

① 目前对于中东政治变局的性质尚未有定论,国内普遍使用“动荡”暂作界定。因此,本文中凡涉及阿拉伯国家的均用“动荡”一词,凡涉及西方抗争政治理论或来源于西方媒体的则采用“革命”一词。

的过程与结果也各不相同)、持久性(不同程度的政治变革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在若干中东国家持续进行)和不确定性(中东政治变革的走向及其对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都难以预测)等特点,学者们的研究视角、方向和课题也趋于多样化。其中,研究视角主要有三个:一是政治学和经济学视角,多从政治体制、政治组织、社会阶层与宏观经济等层面分析这次变革的起因与前景。如田文林通过分析阿拉伯政治运行的内在逻辑,即宗派主义、威权主义和现代国家意识,指出中东现行模式弊端丛生,实际是掌权者阶级的属性出了问题,因此政治变革的关键,应是进行阶级革命。^①二是国际关系学视角,主要从地缘政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外交和国际组织等角度探讨地区和世界政治力量在这次变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一变革对未来国际关系的潜在影响。如刘中民认为,民主化、世俗化以及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构成了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变革的三大核心议题,而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土耳其、伊朗四大力量的地位变化和地区热点问题的复杂化则成为中东地区格局变化的主要趋势。^②三是社会人类学视角,主要从社会心理、思潮、风俗、文化、教育、人口流动和信息传播等层面,挖掘这次变革背后的深层社会动因,以及对中东国家及全球伊斯兰社群在集体心态和观念上的影响。如郭宪纲认为,当前阿拉伯世界动荡反映出来的态势是:世俗力量的救国和改造社会的道路难以为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渐趋式微。阿拉伯世界面临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即寻找一条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发展道路,建立既适应现代社会和国际潮流,又尊重本地区历史和文化传统,包容宗教和世俗民主的政治体制。^③这些研究的方向主要分为因果研究和意义研究,前者指这次变革的起因、过程、发展与前景;后者指这次变革在当代世界政治、社会运动和思潮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政治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影响与意义等。

在这些研究中,有学者运用社会动员理论,从底层政治出发来分析阿拉伯变局,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印度学者帕萨·查特杰曾指出,底层历史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底层意识的内部也是分裂的,它是由来自支配和从属阶级双方经验的元素建构起来的。底层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这些自下而上的力量一旦崛起,不仅能够形成与精英抗衡的话语,而且本身就是现代社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④如吴冰冰在《从埃及看中东变局》一文中,专辟一个章节分析了埃及的抗议运动。作者比较了21世纪以来埃及发生的数次抗议运动,并将其原因归于下层民众的经济社会诉求缺乏表达渠道,在埃及社会现有政治力量中找不到代言人。^⑤李意从抗争主体、客体、目的、形式和策略等方面,分析了2010年底以来中东国家抗争政治的特点,试图寻找其规律,并指出民主离不开抗争的推动,但抗争政治与民主化并不具

① 田文林《阿拉伯世界权力更替的内在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7期。

② 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若干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郭宪纲《阿拉伯世界第三条道路的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

④ Partha Chatterjee, *Empire and Nation: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36—241.

⑤ 吴冰冰《从埃及看中东变局》,《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5期。

有必然的因果联系。^①曾向红对埃及变局中的跨阶层动员做了深入的分析后指出,公民社会团体、反政府力量、虚拟社交网络等构成了跨阶层动员的基础,而“想象团结”帮助抗议者有效克服了埃及水平网络的一致性与破碎化特征,实现了跨阶层动员。^②国外学者如马里那·奥特威等人撰写的《阿拉伯世界的抗议运动与政治变革》一文,考察了近十年来埃及、约旦、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及海湾国家抗议活动及其深层次原因,指出这些行为最终都会不同程度地升级为政治诉求并为母国带来政治变革。^③马哈·阿卜杜拉赫曼认为,埃及“一·二五革命”是阿拉伯现代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人民通过抗议活动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其中,埃及的反全球化集团(Egyptian Anti-Globalisation Group)与全球正义运动组织(Egyptian Anti-Globalisation Group)的跨国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④不可否认,运用社会动员理论来研究阿拉伯变局的著述不少,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尚未用西方抗争政治理论研究阿拉伯的抗争事件。事实上,作为社会动员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争政治理论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意义,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分析视角,从而丰富学界对有关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的研究。本文拟以上述学者的分析和研究为基础,通过分析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导致的不同结果,对这些国家的抗争政治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评价与反思。

一、阿拉伯国家抗争政治的动因

长期以来,社会抗争的研究都侧重于社会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路径。查尔斯·蒂利将国家与政体引入社会抗争研究之中,促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根本转向,抗争政治就此形成。相对于全球抗争政治而言,国家范围内的抗争政治主要有如下意义:微观上,个人、集体抗争是维护和实现自身权益的“最后武器”,是公民人权得以保证的最后砝码;宏观研究上,抗争政治对被抗争的国家体制乃至社会结构都有一定的影响。^⑤正如抗争政治研究的集大成者——查尔斯·蒂利、麦克亚当和塔罗等学者指出的那样,介于暴力革命和议会政治之外的第三个空间——抗争政治对体制政治的影响、对民主化的推动是积极的。^⑥蒂利指出,传统国家为了应对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而促使传统国家从封建化的间

① 李意《中东国家抗争政治的特点分析》,《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

② 曾向红《埃及变局中的跨阶层动员》,《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

③ Marina Ottaway and Amr Hamzawy, “Protest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Arab World”, i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nuary 28, 2011.

④ Maha Abdelrahmana, “The Transnational and the Local: Egyptian Activists and Transnational Protest Networks”,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8, No. 3, 2011.

⑤ 孟宪平《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人权诉求》,《社会主义论丛》2007年第2期。

⑥ 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接统治转向中央集权化的直接统治。一方面,战争促使国家对内的权力扩张,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的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于是对此更为有效的直接统治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汲取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着结构性的冲突,从而引发抗议性的集体行动。^①这一行动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传统的涂尔干社会学将骚乱、罢工、起义和革命等非制度化的抗争政治归结为社会失范,并试图将此类社会现象解释为社会的瓦解。蒂利的理论彻底扭转了涂尔干社会学对抗争政治的解释,他认为,抗争政治与制度化的非抗议政治同样是推动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

具体而言,抗争政治是诉求者及其诉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相互作用。它包含三个要素:一是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的互动;二是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诉求;三是以政府为诉求的对象或目标。^②根据这个定义,“抗争政治”涵盖了社会革命、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等各种以大众动员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过去学者们常常集中于关注和探讨社会抗争和革命如何推动权力制约和民主转型,探求政治变迁的社会动因。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不仅社会抗争和社会革命会推动国家的政治变迁,反之,国家制度结构和国家性质、背景及政策也会引发或塑造社会抗争与革命。

(一) 国家性质

传统的“解压阀”理论认为,民主国家最不容易出现革命,因为选举是阶级意识的坟墓,也是革命运动的坟墓。^③相反,威权国家中政党对于国家机构的垄断,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压制、对信息媒体的控制以及对民众实施的镇压和威胁等,都容易引发社会抗争。一方面,国家的压制性导致了抗争主体利益和身份的同质化。威权国家的统治虽然使社会抗争动员网络狭窄,但其国家权力的垄断性和压制性却在无意中推动了社会抗争;另一方面,威权国家权力的垄断所带来的合法性问题使得社会运动往往都针对国家,社会的诉求容易走向极端化。^④由于政治结构的封闭,当权者和抗议者之间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没有温和的选择。

中东大部分国家在二战后走向民族和解与政治独立,其政治体制既有君主制,又有共和制。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继承了处于分化中的传统社会,但却未能进行必要的社会整合。民族主义激进情绪支配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抛弃传统社会而另辟炉灶的现代化建设上升为官方的政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先进技术的

^① Sidney Tarrow, “The People’s Two Rhythms: Charles Tilly and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8, No. 3, 1996, pp. 586—600.

^②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98—127.

^③ Jack A. Goldstone, “Toward a Fourth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2001, pp. 139—187.

^④ Teresa Wright, “Organization, Mobilization,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Opportunity”,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Popular Contention in Chin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October 5—7, 2006.

输入,使得这种政策的推行成为可能。于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逐渐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即传统社会的分化与现代社会的发育。一方面,传统社会不再完全是阿拉伯人效忠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主义也未能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需求。^①这种状态逐渐成为中东社会焦虑不安的根源。

与此同时,不少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在领导民族独立运动和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中建立了政治权威,并将之转化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奉行的是个人威权、家族政治和一党制。这些领导人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居功自傲,不断培植家族和亲信势力使执政阶层“固化”,最终形成了僵化的政治模式——政治墨守成规,危机意识淡漠,应对措施僵化。他们的统治规则“通常是一个人的政府,他使用法律和国家的压制性工具达到垄断权力的目的,同时拒绝给予那些同他竞争的组织以政治权利和机会”。^②然而,当代中东社会现实表明,威权模式下的政治强人本身存在着巨大局限性,他们难以解决现代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新的时代催生着人们观念的变化,普通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主体意识和公民意识逐步觉醒,他们不仅要求改变现状,而且要求结束强人政治统治,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政权。因此,阿拉伯威权国家中政治强人的集权、恋权和独裁造成政治体制僵化,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导致严重的政治腐败,它们从根本上瓦解了其统治者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抗争政治一触即发。

(二) 变动的政治背景

抗争政治成为民主转型推动力量的同时,政治系统的逐步开放和变动的政治背景也为抗争政治提供了重要机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贝尔福讲座教授杰克·斯奈德指出,如果在民主化进程启动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脆弱,那么从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独裁体制(dictatorship)或君主专制体制(absolute monarchy)向有一定民主特征且有一定威权特征的混合政治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该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的四倍。^③也就是说,开放与封闭并存的“中间状态”容易导致社会抗争。艾辛格考察了美国的一些城市,发现有些城市骚乱频繁,而有些则没有。他指出,有制度开放空间的城市可以通过传统或者常规的政治参与途径解决不满,从而防止骚乱;政治结构封闭的城市也可以通过镇压或者压制异见者,从而防止抗议的发生;而那些同时具有“开放”和“封闭”特质的城市最容易发生暴乱。^④蒂利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也认为,在政治开放度的两端,即在政治系统完全开放和完

^① Dovid E. Long, Bernard Reich, and Mark Gasiorowski,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Afric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2007, p. 496.

^② Maye Kassem, *Egyptia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4, p. 82.

^③ Edwar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 A.: The MIT Press, 2005.

^④ Peter Eisinger,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7, No. 1, 1973, pp. 11—28.

全封闭的情况下都不容易发生抗议。^①由此可见,不管是封闭还是开放都不容易产生社会抗争,社会抗争往往发生在那些处于两者中间地带的地区或国家。

中东国家的政治体系具有典型的破碎性、脆弱性和可渗透性等特征,长期面临着系列严峻挑战和重要任务,其政治体制十分薄弱,如处于战乱和动荡环境、发展民族经济遇到瓶颈、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建设尚未完成、政治合法性与继承危机问题频发、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出现摩擦、缺乏监管机制和腐败问题严重、社会财富没有合理分配等。伊拉克战争后,布什于2004年初提出了美国的“大中东民主倡议”,在第二任期之始,更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民主宣教来试图改变中东的政治文化。然而,正如福山指出的那样,渴望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复制可预测性和公式化最终一定是徒劳的,因为人类社会非常复杂,远非总体水平模式。如果在政党、工会组织、专业协会和能够规范参与活动的其他组织发展成熟之前,政治体制过早地进入对抗性的民主,结果可能产生混乱。^②近年来,为了尝试与全球化接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其政治发展处在由传统专制主义(或集权主义)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转型时期。这些国家为顺应潮流进行了民主化实验,从原来的封闭政体转向一定程度的开放。这种介于开放和封闭之间的混合体制为社会抗争提供了土壤,当它与中东国家相对薄弱的政治体制相结合时,抗争政治便会发生。

(三) 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

在威权国家中,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也会引发抗争政治。基茨切尔特借用系统分析的概念,将“政治系统的开放性”称为政治输入结构,将“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称为政治输出结构,后者指的是政治系统将需求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能力。^③这两者一起构成了政治机会结构的两个维度。在政治系统较为封闭的国家,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强,抗争行为就会影响到政治精英推动有限的内部政策改革;如果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弱,那么,抗争行为将有可能颠覆现有政权。

在普通民众眼中,政府既是国家政治和国家权力的化身,也是他们利益的天然捍卫者,一旦他们的利益受损,很容易把矛头对准政府。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利用民众期盼国家主权独立和经济强盛的愿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巩固执政党权力和家族势力,为了控制权力体系不断操控政治。发生动荡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长期执政,如本·阿里统治突尼斯20多年,穆巴拉克统治埃及30多年,卡扎菲统治利比亚40多年。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治国方法严重滞后,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处理不当,掌控政局的能力不断弱化,引起人民的普遍质疑和严重不满。同时,这些领导人多因贪腐而失去民心。在埃及,贪污受贿、收回扣、要小费是司空见惯的事

^①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McGraw-Hill, 1978, p. 125.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p. 213.

^③ Herbert P. Kitschel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1, 1986, pp. 57—85.

情,政府官员的贪腐程度更是令人瞠目;突尼斯的贪污腐败也相当严重,总统本·阿里的家族都有巨贪之嫌。几十年统治之看似牢固的社会基础,因其贪得无厌而失去民众信任。

阿拉伯国家抗争政治的发生充分体现了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虚弱,也造就了“U一代”^①。由于这些国家缺乏经济保障和制度建设,新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社会化过程并不完全”,困扰于失业恐慌、越轨犯罪、认同迷失和忠诚缺位等问题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危机人群”。政府政策执行能力的下降,加之“U一代”与新兴社交媒体结合,成为引发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阿拉伯领导层曾经支持过一系列让阿拉伯人引以为豪的伟大事业——泛阿拉伯团结、反抗西方国家、抵抗以色列,然而,如今它是消极被动或软弱无力的。不管欧亚非三洲的政治版图发生多大变化,出现过多少风起云涌的人民运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似乎更多地置身于这一浪潮之外。^②这样的政府缺乏容纳新的社会参与的机制,极易造成所谓的“执政官主义”(praetorianism),^③民众的政治参与形式只能是罢工、示威游行、抗议和暴力。

二、阿拉伯国家抗争政治的结果

客观地说,对抗争事件后果的评估难度极大。即使在西方学界,其难度也是公认的。其结果既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反向的;既可能有即时结果,如行动者直接诉求的解决,也可能有“溢出效应”,即超出直接诉求之外的连带效应;既可能有对行动者个体或群体层面的影响,也可能有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结构层面的影响。^④总体而言,学者们对抗争政治的后果持三种观点:一是“肯定论”,肯定其积极功能和影响;二是“否定论”,强调其负面效应和影响;三是“辩证观”,认为抗争行为本身可以宣泄社会压力,有助于问题暴露和政府工作的改进,但要辩证看待抗争事件的危害及影响。

抗争政治强调自下而上的路径方式,在西方民主国家里,它是直接民主的价值体现。抗争本身就是对民主的诉求,而这种诉求意味着人民试图召唤民主元素的回归,即直接民主。在抗争政治的民主理念里,人民本身就是政治人,他们必须担负起直接的责任,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从而推动政治决策的多元化发展。因此,抗争使得民众接近政治系统的可能性增多了。^⑤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

① 指无成就的(unfulfilled)、未被接纳的(unincluded)、未充分就业的(underemployed)以及被低估的(underestimated) 16岁至30多岁的青年群体。

② Kourosh Ziabari, "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ab World?"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3, 2011.

③ 亨廷顿认为,如果在政治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大幅度推进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就容易出现军事集团(执政官)的威权主义。

④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p. 137.

⑤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政治抗争,是直接民主的价值体现,是对公民新型政治参与和政治决策多元化的现实追求,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蒂利对民主化和抗争之间的互动是十分乐观的。他认为,民主来自民众的抗争,甚至动员和重塑民众的抗争。通过研究瑞士和墨西哥两国的民主化案例,蒂利得出结论:虽然他们的民主路径不同(强政府与弱政府),但最后他们通过抗争都实现了民主化。而且,抗争与民主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连续不断的,各种民主政体在抗争政治中形成,反过来又影响抗争政治。^①

然而,在中东威权国家里,抗争政治的结果则复杂得多,简单断定抗争能够带来民主化未免过于武断。虽然抗争政治可以成为民主转型的催化剂,但这个催化剂只有在恰当的“政治机会”中才能起反应。谢岳认为,在威权国家里,抗争促进转型的内外部机制并重。从抗争的内部机制来说,要有五个条件:抗争的规模和强度、民主诉求的公共性和全国性、抗争目标的策略性设计、抗争组织的权力集中、抗争方式的和平性。内部机制具备后,还要有外部机制的配合,一是政体内部存在着结构性衰败因素,即统治集团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体制内精英分裂,改革势力已经力压保守势力占据主导,这样才可能产生抗争同改革势力的联盟;二是国家能力的强弱,如果统治集团保守势力仍然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那么抗争的结果就是被镇压。^②可见,在威权国家,抗争政治是否能够推动民主转型,还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抗争仅仅作为转型的催化剂,能不能被激活,还需要内外部诸多条件加以配合。抗争政治属于社会运动,这种集体行动不会独立于政治之外而形成,也不会政治之外自行壮大与消失,事实上,抗争行为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相互塑造的关系。在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可能出现以下结果:

第一种结果是被镇压。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是抗争已经呈现一定的规模和强度,而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现有体制是封闭的,保守势力不愿意向抗争势力妥协,结果就是被镇压。相对于包容而言,镇压无疑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它构成了社会抗争不得不考量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国家的镇压可以迅速扭转本来极易进行大众动员的社会形势。当然,对国家而言,镇压也是有成本的。它很可能刺激其他行动者走向街头,使得反对者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洪流。因此,达致稳定的目标往往需要国家采取多种策略的组合。以叙利亚为例,自2011年3月中旬爆发抗议活动以来,抗议民众遭到巴沙尔政权的严酷镇压,已造成数千人死亡。不断的抗争引发不断的镇压,巴沙尔可谓进退两难,其高压政策更是导致叙政权的孤立。现政权虽然短期内尚能支撑,但最终改弦更张似乎不可避免。

第二种结果是民主转型的实现。抗争的激活机制在抗议行为中产生,抗争者同体制内改革势力结成联盟,推动了民主转型的步伐。当然,抗争本身难以生成民主转型,只有同体制内的改革势力结盟才有可能。裴宜理明确指出,在一个威权体制下,即国家政权强大而公民社会弱小的环境里,有效的抗议网络往往得益于同国家

^①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p. 225.

^② 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3页。

政权的密切联系。^①内外部机制必须有效结合,抗争才可能产生民主转型。不过,中东国家的民主具有自身特质。民主化是一种制度变迁,无论突发式的还是渐进式的,这一变迁都不可能脱离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现实,而这些国家最基本的政治现实是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②此次阿拉伯民众的抗议事件一开始都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方式。游行示威没有明确的政党和领导人物出面组织,事先也没有具体的计划和部署。群众运动的目的大多要求在政权更迭的基础上,通过立宪、修宪、议会选举和大选,开展国家的制度化建设。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伊斯兰宗教势力逐步介入和参与,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以在阿拉伯国家极具影响力的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为例,它曾是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最大的政治反对派。阿拉伯国家的动荡使穆兄会不但摆脱了在埃及的非法地位,而且还顺应形势,组建了“自由与公正党”参加政治斗争。至今,诸如穆兄会那样持相对温和主张的伊斯兰组织,已在突尼斯、摩洛哥和埃及的选举中取得领先地位,成为中东地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第三种结果是加剧动荡。从政治角度看,尽管大多数动荡的阿拉伯国家已经完成政权更替,但政局依然不容乐观。也门国内局势并没有因为萨利赫的离开而趋于平静,目前依旧混乱。埃及社会面临着多重挑战:局势动荡后,外国直接投资、外汇收入等骤减,外汇储备已接近“非常危险的程度”;围绕先制定宪法还是先举行选举,世俗派力量同宗教党派展开激烈争论;斡旋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的外交努力受挫。国家形势走向的不确定,令埃及民众感到迷茫。2011年10月突尼斯在议会选举完成后,各政党间的权力争斗反而日趋白热化,致使宣誓就职不久的议会被迫休会。利比亚虽然被西方军事征服,但留下诸多难以化解的后患。叙利亚社会危机不断升级,恐怖袭击等暴力事件频发。从经济角度看,中东动荡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并可能使其陷入恶性循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10月份公布的报告显示,阿拉伯国家的动荡给相关国家至少造成5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利比亚和叙利亚受到的冲击最大,埃及、突尼斯、巴林和也门紧随其后。这些国家的GDP总量锐减,财政收支平衡恶化。利比亚的国家经济活动基本停止,GDP损失达77亿美元,国家财政损失预计达65亿美元;埃及2011年前九个月的公共支出增长到55亿美元,而财政收入则下降7500万美元;也门骚乱给政府财政带来8.58亿美元的损失;突尼斯全国80%的企业在动荡中受到冲击,导致失业人口急剧攀升,目前已突破70万,同时全国物价飞涨,部分生活必需品短缺。^③

第四种结果是外部势力强势介入。发生抗争政治的国家分为和平示威和暴力冲突两种方式。前者如埃及、突尼斯,后者如巴林、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外力

① (美)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阎小骏译,《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② 丁隆《伊斯兰教与中东民主化进程》,《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6期。

③ 《中东地区动荡局势至少造成550亿美元经济损失》, <http://news.cn.yahoo.com/yopen/20111023/654931.html>。

介入的对象主要是后一类国家。出面干预阿拉伯国家的外力有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地区组织(北约、东盟、非盟、海合会)以及地区国家如土耳其、伊朗等。它们介入的方式最激烈的是采用军事手段,如西方持续空袭利比亚,武力干涉从2011年3月19日开始,历时5个多月。海合会则联合出兵巴林,帮助维持稳定,调解并迫使萨利赫总统下台,同时以海合会为新领导核心的东盟还积极干预利比亚与叙利亚。对叙利亚一面实施制裁,一面派观察团入境监督,以迫使叙政府执行它与东盟签订的协议。与此同时,外力干预特别是西方奉行的“多重标准”使中东局势渐趋复杂,对沙特等海湾国家竭力保护现政权,鼓励、纵容政府镇压民众抗议;对埃及、突尼斯、也门等发生严重动荡,局势难以控制的国家,则因势利导,力图使其未来走向纳入西方轨道;而对利比亚、叙利亚、伊朗等反西方或与西方关系不睦的国家,则推波助澜甚至直接进行军事打击。外部势力的长期介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给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局势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对阿拉伯国家抗争政治的评价与反思

对于抗争政治理论能否适用于任何一种政权类型与发展水平的国家,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社会运动理论主要系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得出,在很多西方国家之外的地区难以得到验证,理论局限性较大,而抗争政治理论则主要建立在不发达国家的研究基础之上,尽管有些研究也是基于北美与西欧国家的经验,但这些国家发生革命的时间已过去了上百年,当时也曾处于欠发达状态,因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①另一种看法认为,该理论虽然有助于揭示抗争政治这种“一般性现象”,但不能过分强调它的“普适性”,尤其是一些阿拉伯学者对于能否将其用以解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过程仍心存疑虑。^②尽管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抗争政治理论有助于人们了解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和机制,这种尝试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③

在理论方面,抗争政治既有积极性,又有局限性。抗争政治中的抗争者多来自底层社会,与抗争客体相比处于弱势地位。他们诉诸非制度化的,带有一定对抗、冲突色彩的政治行动来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对其所关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施加影响。其新意在于以非正式的、草根的行动主体及非制度化行动,在良性对抗、冲突、抗争中实现正式制度和组织不能达到的绩效,对全球民主、全球治理等方面具有

^① 谢岳、曹开雄《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② Asef Bayat, “Islamism and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6, No. 6, July 2005, pp. 891—908.

^③ Oded Haklai, “Authoritarianism and Islamic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Research and Theory-Build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1, No. 1, March 2009, pp. 27—45.

正面效应。^①此外,以抗争政治为代表的社会运动与国家、政党等常规政治行为体系联系紧密,即抗争政治与常规政治通常是相互渗透的。它至少表明,普通公民的政治意见是值得咨询的。作为跨越制度化政治与非制度化政治藩篱的社会抗争,正是在国家、政党和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关注普通政治参与者,尤其是底层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从而实现多元社会的民主与善治。当然,抗争政治也有其功能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上文所提及的抗争政治的特点决定的,即非预测性、非理性、非正常性、非组织性等特性。特别是这一社会运动在国际制度环境中仅仅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的整合功能并没有强制性,完全是通过呼吁、行动来扩大影响,借以“唤醒”各种行为体的“道德良知”,使之自觉遵守共赢的相关准则,从而达到抗争的目的。由于它缺乏必要的资源,因而对政府或政府间组织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在实践方面,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主要以非暴力抗争来推动政治变革,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具有推动作用。首先,突尼斯与埃及的动荡已经在中东地区产生了“多米诺效应”,阿拉伯社会已经通过这次政治变革重建了尊严与信心,这是未来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力量源泉。其次,威权统治下的旧势力已无法轻易窃取革命果实。阿拉伯国家在经历一番动荡之后,临时政府对于政治变革与政治重建的任何迟滞与保守,都会激起社会的广泛质疑。最后,伊斯兰极端势力已经无法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更是如此。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团体本身也变得更加多元,他们将在政治重建中寻求与其他政治派别的合作而非互相打压。^②

然而,我们在肯定阿拉伯国家抗争政治的同时,也无法忽略这场政治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自 2010 年底开始的中东剧变浪潮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动荡与变革”阶段,以推翻现政权为特征,时间可能持续 1—2 年;第二阶段为“自适应调整”阶段,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为特征,政治系统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自动调整自身结构和功能,这一过程至少需要 3—5 年,甚至数十年。其前景如何,并不明朗。阿拉伯国家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是就业与经济发展等困扰许多阿拉伯国家多年的历史难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武力冲突。利比亚反对派虽然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武器流失、派别纷争和卡扎菲的横死,都给以自发性、自主性与非暴力著称的“阿拉伯之春”蒙上了阴影。也门与叙利亚的社会分裂和内战危险,也给阿拉伯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此外,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否真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值得怀疑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在也门动荡中趁机壮大,就是一个反例。简言之,只要中东地区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不发生根本性变化,就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

^① (美)杰克·A·戈德斯通主编《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章延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3页。

^② Robin Wright, *Rock the Casbah: Rage and Rebellion Across the Islamic World*, Simon & Schuster, 2011, p. 159.

的独立自主的民主政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也会继续存在。

西方抗争政治理论的理想结果是实现民主转型,但在中东国家,蛰伏多年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则成为最大受益者。在突尼斯,“复兴运动党”于2011年10月23日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议会217席中的89个席位,成为制宪会议中的第一大党;摩洛哥众议院于2011年11月25日提前举行大选,温和的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获得395个席位中的107席,大大领先于其他各政党;而利比亚过渡政府在2011年11月24日成立时,其领导人也表示今后要以伊斯兰教作为立法基础。^①在埃及2012年5月28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穆兄会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排名第一,并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伊斯兰势力之所以能够得势,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国家多年实行高压统治,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从而使宗教势力得以积蓄力量并成长壮大。然而,这些政治伊斯兰势力要想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则十分困难。以埃及穆兄会为例,虽然其组建的“自由与公正党”致力于淡化宗教色彩,但仍无法掩盖其伊斯兰属性,因而难以获得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和世俗主义者的支持。同时政治伊斯兰势力并非一个整体,分属穆兄会、赛莱菲派、苏菲派和赛莱菲—吉哈德派等派别,其中赛莱菲派的“光明党”是穆兄会的主要竞争对手。这无疑将使政治伊斯兰阵营分化,并进一步削弱穆兄会的力量。更何况埃及在此轮政治剧变后,穆兄会内部出现分裂迹象,积极参与抗议示威的“穆兄会青年”与主流派产生分歧。部分穆兄会成员组建了“埃及潮流党”(al-Tayyar al-Misri)、“先锋党”(al-Riyada)、“复兴党”(al-Nahda)、“社会与和平党”(al-Mujtama'a wa al-Salam)等小党派,吸引大批穆兄会青年加入。^②可以说,穆兄会的政治命运取决于其如何与现代性融合,若要成为促进社会变革和进步的积极力量,带领埃及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无疑还要克服许多困难。

有学者指出,失败的民主化尝试会煽动偏执的、反民主的制度和思潮——如种族政治、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的兴起,军队的政治化以及军国主义模式的形成,而这些政治力量及相关的政治思潮会令随后的民主化进程更加艰难。^③在抗争政治取得阶段性胜利后,阿拉伯国家将面临漫长的过渡期,其间一旦出现失序状态,要么强人政治或者军事独裁卷土重来,这种情形在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地司空见惯;要么就会陷入缺乏强有力政府的混乱状态,即使在政治建构上点缀一些民主选举的政治符号,也很可能“逢选必乱”。加之强人政治曾经是阻碍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一道屏障,随着强人政权陷入危机甚至垮台,激进主义或极端势力极有可能趁机崛起,中东未来的政治版图充满了风险与悬念。

① 田文林《中东政治生态面目全非 阿拉伯复兴路艰难》,《人民论坛》2012年1月(上)。

② Hanan Solayman, “Muslim Brotherhood’s Young Members Dismayed at New Leadership Appointments”, <http://www.thedailynewsegypt.com/index.php>.

③ (美)杰克·斯奈德《民主化、民族主义与战争》,《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117—125页。

四、结 语

2010 年底以来在中东地区爆发的抗争事件,以反专制、反腐败、追求自由、要求社会公正为诉求,体现了阿拉伯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它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力量格局、社会形态、宗教与世俗力量对比,对世界大国力量博弈、文明结构的动态变化等产生现实和深远的影响。本文运用抗争政治理论来解读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试图对传统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进行中东实证的补充,进而呈现中东底层民众或弱势群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典型形式。不过,蒂利有关抗争政治的分析和论证带有典型的西欧经验色彩,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情形与之相比有较大不同,对这些差异带来的分析限制,研究者应该谨慎对待。抗争政治在西欧往往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组织化程度较高,其结果也时常导致原有社会边界的变化。但在中东地区,由于各国间的政治机会结构、动员资源和社会运动架构等存在较大差别,社会抗争多是个体开展的、分散的、无组织的、小规模持续性抗争,个体利益的实现程度是衡量抗争成败的关键。他们透过“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来开展抗争,很少能改变原有的社会边界。^①在民主化方面,阿拉伯国家构建公民身份的历程与西欧国家也有不同,加之受政治伊斯兰因素的影响较大,因而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中东国家的抗争实践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阿拉伯国家的抗争实践来看,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对阿拉伯国家社会抗争的政治面向的研究,借鉴西方理论的已有成果,深入分析阿拉伯国家塑造抗争政治的过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抗争政治理论推断的正确性,同时也提出了更多难以完全依靠现有理论解释的问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责任编辑:李 丹)

^① (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郝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6页。